

诗学视角下的翻译研究

曹丹红 著

翻译理论与文学译介研究文丛 总主编 许钧



南京大学出版社

诗学视角下的翻译研究

曹丹红 著

翻译理论与文学译介研究文丛 总主编 许钧



南京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诗学视角下的翻译研究 / 曹丹红著. —南京: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15. 6

(翻译理论与文学译介研究文丛/许钧主编)

ISBN 978-7-305-14479-0

I. ①诗… II. ①曹… III. ①文学翻译—研究 IV. ①I04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304268 号

出版发行 南京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南京市汉口路 22 号

邮 编 210093

出 版 人 金鑫荣

丛 书 名 翻译理论与文学译介研究文丛/许钧总主编

书 名 诗学视角下的翻译研究

著 者 曹丹红

责任编辑 陈蕴敏

照 排 南京紫藤制版印务中心

印 刷 江苏凤凰通达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635×965 1/16 印张 23.25 字数 269 千

版 次 2015 年 6 月第 1 版 2015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305-14479-0

定 价 48.00 元

网址: <http://www.njupco.com>

官方微博: <http://weibo.com/njupco>

官方微信号: njupress

销售咨询热线: 025-83594756

*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 凡购买南大版图书,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所购图书销售部门联系调换

本书系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

“西方诗学视角下的文学翻译研究”项目（10YJC74006）研究成果

江苏高校优势学科建设工程资助项目研究成果

A Project Funded by the Priority Academic Program Development of
Jiangsu Higher Education Institutions

001	绪论
001	第一节 现状之审视及问题之提出
009	第二节 梅肖尼克及其翻译诗学
026	第三节 翻译研究的诗学视角：现状与发展
047	第一章 诗学的概念与内涵
052	第一节 早期的诗学理论
062	第二节 中世纪至 19 世纪末的诗学理论
066	第三节 现当代诗学：以文学性为中心
083	第二章 在文学性中把握文学翻译的本质
086	第一节 文学性与陌生化
096	第二节 陌生化的多个层面
118	第三节 局部与整体：陌生化技法与风格
124	第四节 文学翻译个案分析：陌生化效果的再现
145	第三章 多义性及翻译对多义空间的重建
150	第一节 朦胧：文学作品的语义特征
157	第二节 朦胧的七种类型
163	第三节 文学作品语义朦胧之成因
175	第四节 翻译对多义空间的重建
201	第四章 “文本” 的价值与翻译的标准
205	第一节 作为价值之体现的“文本”
216	第二节 作为“文本”的翻译
228	第三节 从文学翻译到翻译文学

239	第五章 论“文字翻译”的诗性维度
244	第一节 “文字翻译” = 逐字死译?
251	第二节 文字性的本质及其表现
260	第三节 “文字翻译”: 再现原作之诗性
270	第四节 “文字翻译”: 触及存在之诗性
283	第六章 诗学节奏观与翻译忠实性研究
287	第一节 传统忠实观: 难以调和的矛盾
297	第二节 形式与意义: 从二元对立到辩证统一
307	第三节 诗学节奏观
316	第四节 忠实于节奏: 从语言对等到价值重构
329	结论 文学翻译的根本在于文学性的传达
339	参考文献
357	后记

第一节

现状之审视及问题之提出

中国的翻译研究已经经历了特点鲜明的几个周期。第一个周期以三国支谦所著的《法句经序》为开端，一直延续到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传统译论时期。这一期间，中国的译论基本遵循支谦论翻译的模式，即对翻译活动的谈论往往以自己或他人的经验为基础，以文本为依托，以探讨翻译方法和技巧为中心，以随想感悟为论述方式。第二个周期始于 20 世纪 80 年代，中国开始译介西方翻译理论著作。经过二十多年的发展，接受、消化并吸收了西方译论的中国翻译研究界呈现了多元发展的面貌和趋势。一方面，翻译史、翻译本体、翻译主体、翻译批评等研究扩大了翻译研究的对象；另一方面，语言学、符号学、社会学、现代阐释学、伦理学、心理学、文化理论等其他学科的理论和方法也为翻译研究者所借鉴，为翻译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新的视角。在西方理论的影响下，中国的翻译理论研究在这三十年内也经历了两次重要的转向：文化转向与社会学转向。这两次转向也意味着翻译研究范式的转变，研究者的视

阈开始从微观走向宏观，从文本内走向文本外，人们不再满足于简单地将原作和译作进行文本比较，也不再局限于探讨翻译的方法和技巧，而是将目光投射到了文本之外，将翻译活动置于文化交流的大背景中，通过考察社会、文化因素与翻译活动的相互作用来解释或重新解释翻译活动中的种种现象。在这一过程中，人们对翻译活动的理解越来越深，翻译活动的重要作用也日益得到社会的承认，其地位也逐渐得到了认可。对于翻译研究者来说，这不能不说是一件幸事。外国译论的集中引入当然也并非没有产生一定的负面影响。考察本世纪初以来在中国各种语言类核心期刊上发表的文章，我们不难发现学者对西方理论的热情，以及急于借助西方理论来解决中国问题的迫切心情，因此类似解构主义、女性主义、后殖民主义、文化资本等术语在翻译研究领域频繁出现，而此类研究也一度成为学术研究中的时髦现象。幸而近几年来，研究者对外国理论的看法渐趋理性，即便再有对国外理论的译介和研究，也往往立足于我们自身的问题，试图做到理论与实际的相适应。与此同时，翻译研究更关注国家和社会的现实问题，开始愿意放下身段，走出象牙塔，对形而下的东西展开了更多的探讨，促使翻译行业、翻译政策、翻译市场、翻译教学等话题也开始进入翻译研究的范畴。2012年是中国翻译工作者协会成立30周年的年份，这一年，许钧发表了《翻译研究之用及其可能的出路》^①一文，谢天振发表了《新时代语境期待中国翻译研究的新突破》^②一文，穆雷发表了《也谈翻

① 许钧：《翻译研究之用及其可能的出路》，《中国翻译》2012年第1期，第5—12页。

② 谢天振：《新时代语境期待中国翻译研究的新突破》，《中国翻译》2012年第1期，第13—15页。

译研究之用》^①一文……这些承上启下的重要文章表明，中国翻译研究界开始总结过去几十年的成就与不足，试图为未来的翻译研究提供一个更为清晰的方向；这或许也表明，中国的翻译研究实际上正在进入一个新的周期。

但我们也看到，在中国翻译研究逐渐体现出自主与自信的同时，研究领域内部的发展并不是非常平衡的，而恰恰是理论本身的成熟程度使得这种不平衡现象更加令人担忧，因为它表明不平衡不是盲目的结果，而是无奈的选择。这种不平衡的表现之一便是：文本外研究发展迅速，而文本内研究却似乎遭遇了瓶颈。文本内研究的这种困境也体现在多个方面。首先，很多文本内研究很容易就陷入对个别语言现象或某个具体文本翻译的探讨，关注“技”的层面多过“道”的层面，在理论的普适性上还有所欠缺。事实上，这一类文章在很多学术期刊中也常常被列入“译技探讨”的行列。其次，某些文本内研究缺乏系统的理论的支撑和行之有效的方法的指导，在文学翻译研究方面尤其如此，研究似乎很容易陷入中国传统翻译研究的老路，中国的传统美学观仍旧是研究的理论依据，实证性的文本比较仍旧是研究的方法，经验性的随想仍旧是研究的结论。最后，通过对近年来发表的期刊文章的考察，我们看到，今日的文本内研究的确从不少学科借鉴了诸多新的理论和方法，例如诗学理论、德国功能学派理论、叙事学理论，等等，为理解翻译活动提供了新的视角。但是，文本内研究最终要落实到文本与文字，研究者的视线总是被语言转换过程牵制。而在文本外研究兴起以前，语言文字转换过程一直是翻译研究关注的对象，在两千多年的思考之后，可以

^① 穆雷：《也谈翻译研究之用》，《中国翻译》2012年第2期，第5—11页。

说大部分问题都得以提出及讨论，文本内研究很难再出现全新的问题系，也不太可能出现全新的结论。这是一种打补丁式的研究，它与尚可开拓新领域而且几乎没有边界限制的文本外研究具有很重要的区别。因此，近几年来，无论从研究的创新性还是发展程度来说，翻译文本内研究似乎都与文本外研究有较大差距，而且差距还在逐渐拉大。当然，从更广泛的角度来看，从内部走向外部是一种趋势。十年前，希利斯·米勒（J. Hillis Miller）在既耸人听闻又富有洞见的《文学死了吗？》中就已指出：“文学行将消亡的最显著征兆之一，就是全世界的文学系的年轻教员，都在大批离开文学研究，转向理论、文化研究、后殖民研究、媒体研究（电影、电视等）、大众文化研究、女性研究、黑人研究等。他们写作、教学的方式常常接近社会科学，而不是接近传统意义上的人文学科。他们在写作和教学中常常把文学边缘化或者忽视文学。虽然他们中很多人都受过旧式的文学史训练，以及对经典文本的细读训练，情况却仍然如此。”^① 翻译研究领域的情况也很类似，研究者逐渐转移视线，这导致文本内研究愈发举步维艰。

翻译文本内研究的现状使得某些学者不禁发出“目前的翻译研究的微观研究路向似乎走进了死胡同”^② 这样的感叹。2003年，谢天振在介绍以色列学者埃文-佐哈尔（Itamar Even-Zohar）的多元系统理论时曾有过这样的疑问：“有人也许会感到担心，跳出文本之外的翻译研究与翻译有什么关系呢？这种研究会不会流于空谈呢？因

① 希利斯·米勒：《文学死了吗？》，秦立彦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18页。

② 武光军：《翻译社会学研究的现状与问题》，《外国语》2008年第1期，第75页。

为迄今为止，仍旧有相当多的人认为，既然是翻译研究，就应该结合具体的翻译实际。离开了翻译的实例谈翻译，有什么用呢？”^①如今，我们似乎应该提出相反的问题：在翻译文本外研究成为主流的背景之下，文本内研究是否还有必要？它将何去何从？

翻译文本内研究是否还有必要？回答当然是肯定的。首先，进行文本内研究是建设翻译学科的内在要求。翻译学科的建立和发展离不开译学研究的深入。对于译学研究，陈福康将其分为“内部研究”和“外部研究”两种模式：内部研究即“本体研究，……如翻译的基本理论模式，翻译的实质，原理，标准，翻译的思维方式，可译性问题，翻译的方法论（直译、意译、音译），翻译程序论，翻译美学，翻译的艺术，风格，技巧，等等”；外部研究即“研究翻译与外界的关系。如翻译在横断学科网络中的位置，翻译与哲学、社会学、文化学、语言学、心理学等等的关系，还包括对翻译教学，翻译批评建设，翻译工作者队伍的建设，翻译工作者修养问题，翻译工具书和教材的编写，中外专家合作问题等等的研究”。^②正确的研究思路，应该是“将微观研究与宏观研究、内部研究与外部研究、技的研究与道的研究结合起来，进行多方面的探索”^③。因此，属于内部研究范畴的文本内研究在任何时候都应该是翻译研究的一个重要部分，不应该受到轻视甚至忽略。其次，文本内研究是揭示翻译活动本质特征的重要手段。王东风曾指出：“就翻译研究而言，解构

① 谢天振：《多元系统研究：翻译研究领域的拓展》，《外国语》2003年第4期，第61页。

② 陈福康：《中国译学理论史稿》，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0年，引言第IV页。

③ 许钧：《切实加强译学研究和翻译学科建设》，《中国翻译》2001年第1期，第4页。

主义迫使我们把专注的目光从意义或所指的确定性转向了意义的不确定性和能指的历史性，从文本之内，转向了文本之外：从文本的静态分析，转向了文本生成与接受的动态成因；从文本的语言分析，转向了与文本传播有关的历史、文化和社会环境。当主流翻译研究都走向了文本之外的時候，我们不难想象，它迟早还要回来。因为，语言和文本毕竟是翻译的根本属性。从语言和语言学的角度研究翻译可以说是一种回归，一种必然的回归，翻译的栖息地毕竟离不开语言，离不开文本，离不开结构。但这种回归已不是简单的回归，因为我们毕竟已经出去过，已经看到了文本之外的大千世界及其与文本之间的互动关系。”^① 我们可能并不一定会认同这段话的所有观点，正如许钧所言：“对翻译研究本体的回归，并不意味着研究方法必然回归到语言学的研究途径。”^② 但是，王东风对于语言、文本之于翻译活动的重要性的认识，其关于翻译活动文本内因素与文本外因素关系的认识，我们甚为赞同，“翻译活动的确是一项跨文化交流活动，但它最根本的属性，是一种语言实践活动，是一种符号转换活动，以狭义的翻译而论，是一种语言转换活动”^③。翻译活动首先体现为语言的转换，同时最终表现为（书面或口头）文本，无论是外部因素对翻译的影响，还是翻译活动对外界环境的作用，都离不开语言和文本。关注语言和文本，有利于我们进一步揭示翻译活动的本质属性，增进对翻译活动的理解。最后，进行文本内研究是促

① 王东风：《功能语言学与后解构主义时代的翻译研究》，《中国翻译》2007年第3期，第9页。

② 许钧：《翻译研究之用及其可能的出路》，《中国翻译》2012年第1期，第9页。

③ 许钧：《翻译研究之用及其可能的出路》，《中国翻译》2012年第1期，第9页。

进翻译实践发展的前提和基础。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出现了历史上第四次翻译高潮,其间涌现了大量高质量的译作。与此同时,伴随着译作数量的日益增多,翻译界也出现了“抄袭剽窃、粗制滥造、误译乱译、质量低劣”^①等不容忽视的负面现象。译作质量的低劣一方面可能是由于某些译者态度不严肃或语言水平欠缺导致的,另一方面也可能是由于译者的理论修养不足引起的。所幸的是,大量出现的并非仅仅是负面现象。近几年,随着网络的发展,人们越来越习惯在公共信息平台谈论翻译,无论是重大翻译问题还是重要译作出版、重要翻译事件等,都会在网络上引发热烈的讨论,此类讨论对于增进译者与读者的沟通,对于译者转变翻译策略,甚至对于译者提高翻译水平都起到了积极影响。但我们也注意到,但凡涉及具体译文或翻译时,讨论的话题往往围绕语言的转换和译者的技艺展开,而讨论的视角和观点似乎很难摆脱中国传统译论的影响,令讨论的效果多少打了点折扣。这也令我们想到,翻译实践活动实际上很需要有方法的、能拓展视野的文本内研究的指导。翻译理论大致可以分为描述性的和规范性的两种。从指导实践的角度来看,描述性研究固然重要,规范性研究更是不可或缺,因为后者旨在提出规则和约束,为更好地进行翻译实践寻求方法。文本内研究是一种描述性与规范性,同时更侧重规范性的研究,它通过对语言转换和文本创作规律的分析,抓住翻译尤其是文学翻译的特征,适当地提出一些建议和方法,以期更好地指导翻译实践,提高译者的翻译水平,为一个国家翻译文学的建立和发展奠定基础。

^① 沈苏儒:《我对翻译研究的基本认识》,《中国翻译》2007年第1期,第36页。

然而，正如王东风指出的那样，今天向文本内的回归已经不再是一种简单的回归，更不是一种倒退。在经历由文本内向文本外再折回文本内这一系列转变之后，重新投向语言和文本的目光已经是一种全新的目光，这一目光更具包容性，它在聚焦语言转换与文本形成过程的同时，也深刻意识到语言、文本与外部世界之间的互动关系。这一目光也更为凝重深厚，它融合了多重视角。首先是王东风所指出的语言学视角，这是不言而喻的，因为翻译涉及两种语言的转换。问题在于，当涉及文学翻译时，单纯依靠语言学理论是否还能行之有效地解决问题？我们知道，文学翻译的对象是文学作品，文学作品的语言除了遵循一般规律之外，还具有自己的特殊性，这种特殊性是文学之所以成为文学、文学作品之所以成为文学作品的根本原因。文学作品的特殊性使得文学翻译区别于以信息交流为中心的非文学性翻译，这种区别在翻译的理解和表达过程中都有所体现：以信息交流为中心的翻译活动，它的理解过程是一个把握原作所指的过程，而文学翻译更加注重的，是研究原作的能指组织方式，把握形式与意义这一统一体所表现出来的价值；以信息交流为中心的翻译活动，它的表达过程是根据译入语的表达习惯，重新组织语句以传达原作所包含的所指信息的过程，而文学翻译更注重在表达过程中再现原作的能指特征，创造性地构建一个新的能指与所指的统一体。这些问题，实际上都已经超出了语言学的范畴，因为语言学理论探讨的是普遍的语言规律及其运用，它将一切话语当作语言符号一视同仁，它或许在分析和比较两种语言的结构时能够大显身手，但在探讨文学作品特殊性时却表现了一定的局限性。同时，语言学往往是描述性的，不涉及价值的判断，但文学却是一门关于文学作品价值的学科。因此，单纯依靠语言学并不能解决文学翻译中

的一切问题。要研究文学翻译的本质特征，恐怕还要依赖以文学作品和写作活动的价值和特殊性为主要研究对象的学科，这门学科便是诗学。

第二节 梅肖尼克及其翻译诗学

根据我们所掌握的材料，法国语言学家、文学理论家、翻译理论家亨利·梅肖尼克（Henri Meschonnic）是第一位明确提出要从诗学角度来研究翻译并将自己的研究冠以“翻译诗学”之名的学者。^①这一主张首次出现在其1973年出版的著作《诗学（卷二）：写作认识论和翻译诗学》中。有关翻译诗学的内容属于著作的第二部分（第一部分为写作认识论），以论文集的形式，收录了《关于一种翻译诗学的建议》《从翻译语言学到翻译诗学》《人们把这称作翻译策兰》《法文版〈圣经〉》等重要文章，他在其中创造性地提出了翻译诗学的概念。之所以提出建立翻译诗学的建议，是因为他认为从必要性上来说，“对文本的翻译同对文本的写作活动本身一样，是一种超越语言的活动，它不能用陈述语言学也不能用雅各布森（Roman

① 我们也可以从梅肖尼克本人对自己研究的评价中看到翻译诗学的独创性，梅肖尼克认为翻译诗学“在认识论上的重要性在于它在以下几个方面的贡献：对一种尚未得到理论化的社会实践进行了理论化，对语言学中的意识形态元素提出了批评，对文学理论及文学社会学提出了批评”。（Henri Meschonnic, *Pour la poétique II : Épistémologie de l'écriture, poétique de la traduction*, Paris, Gallimard, 1973, p. 306.）

Jakobson) 形式诗学的理论进行描述”^①, 而“因其所暗含的文本理论, 翻译诗学不可能是一种应用语言学”^②, 它需要在一种新的理论框架下展开论述。对于这种理论框架怎么建构, 梅肖尼克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这涉及翻译诗学的可能性: “一种关于文本翻译的理论被包含在诗学中, 而后者是关于文本价值及其意蕴的理论。”^③ 梅肖尼克将翻译诗学视作诗学的一个分支, 翻译诗学借鉴的是诗学理论, 或者用梅肖尼克的话来说: “一种翻译诗学的理论只能依赖诗学理论”^④, “翻译诗学实现了源于俄国形式主义和结构主义的诗学理论与现代写作实践的结合。翻译诗学不会割裂理论与实践。它提出了翻译与写作之间具有相似性的假设”^⑤。

梅肖尼克翻译诗学的提出有其时代背景。首先, 它对自己的定位是一种“实践性理论”, 指出“一种文本翻译理论是必要的……因为它能够历史地去认识形成文本的社会进程, 这一进程是一种超越语言的活动”^⑥。它由此反对经验主义, 因为“经验主义无法对形成文本或没有形成文本的经历做出理论总结, 也无法对以作品形式存

① Henri Meschonnic, *Pour la poétique II : Épistémologie de l'écriture, poétique de la traduction*, Paris, Gallimard, 1973, p. 306.

② Henri Meschonnic, *Pour la poétique II : Épistémologie de l'écriture, poétique de la traduction*, Paris, Gallimard, 1973, p. 306.

③ Henri Meschonnic, *Pour la poétique II : Épistémologie de l'écriture, poétique de la traduction*, Paris, Gallimard, 1973, pp. 305 - 306.

④ Henri Meschonnic, *Pour la poétique II : Épistémologie de l'écriture, poétique de la traduction*, Paris, Gallimard, 1973, p. 325.

⑤ Henri Meschonnic, *Pour la poétique II : Épistémologie de l'écriture, poétique de la traduction*, Paris, Gallimard, 1973, p. 364.

⑥ Henri Meschonnic, *Pour la poétique II : Épistémologie de l'écriture, poétique de la traduction*, Paris, Gallimard, 1973, p. 305.

在的翻译和实现文化偏移的行为做出理论总结”^①。从这个表述可以看出梅肖尼克研究的“科学性”倾向。但这种倾向在当时是符合时代潮流的，因为“二次世界大战后，随着科学技术、现代语言学和翻译活动本身的蓬勃发展以及机器翻译的兴起，人们逐渐改变了对翻译研究的传统观点，认为翻译不仅是一种艺术或技巧，而且是一门有规律可循的科学；翻译研究是一个与文艺学、社会学、心理学、数控论、信息论等多种学科有关的学科体系”^②。

其次，梅肖尼克翻译诗学的提出也与当时的翻译研究现状相关。二战后出现的主要翻译研究范式是语言学范式，其中奈达（Eugene A. Nida）翻译理论占据了重要地位。奈达以自身的《圣经》翻译经历为基础，吸收了转换生成语法及结构主义语义学等语言学理论，构建了一种“翻译科学”^③。奈达的翻译理论提出后不久，便遭遇了梅肖尼克的异议，或者说，恰恰是为了反驳奈达，梅肖尼克才萌生了建立一种翻译诗学的念头。对奈达的批判集中体现于《从翻译语言学到翻译诗学》这篇重要长文中。文章一开始，他便树立了批判的靶子：“他（指奈达——本书作者）对行为主义和布龙菲尔德的意义观进行了理论化，这一意义观将意义视作一种反应。从这第一个公设所包括的一切隐含意义中，他总结出一种‘翻译的新观念’，这一观念建立在对转换生成语言学和结构主义语义学种种分析技巧的

① Henri Meschonnic, *Pour la poétique II : Épistémologie de l'écriture, poétique de la traduction*, Paris, Gallimard, 1973, p. 306.

② 谭载喜：《西方翻译简史》，商务印书馆，2004年第2版，第192页。

③ 这种主张在奈达于1964年出版的著作《翻译科学探索》（*Toward a Science of Translating*）就已有所体现。